

## 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

· 耿云志 ·

胡适是个始终关心国际政治的学者。早在民国初年，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就预见到处理对日关系将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他曾因此想到日本作深入的观察，只是他还想不清楚，是作为传道者去呢，还是作为一个学道者去。这种不确定的心态，他似乎始终不曾完全摆脱。因此也可以说，他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始终未能彻底了解。这既同胡适个人的教育背景有关，也同中日两国间充满悲喜剧的历史有关。我们在他的言论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日本往往是毁誉交加，爱恶难定。对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对他们善学别人长处、争强求胜的民族精神，以及爱整洁与爱美的习惯，他都极口称赞；而对他们某些保守的陋俗也时有讥评，对他们的黩武的军国主义更是毫不掩饰其反感。

胡适对日本人的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在后来日本侵华，中国民族危难的时期，使他扮演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角色。

###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战争的序幕。对这一事变，胡适的反应十分平静，平静到近乎不合情理的地步。请看他9月19日的日记：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指丁文江——引者）都谈及到此一着。中日战（指甲午之战——引者）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

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①

这里没有愤怒，没有抗议。有的只是自责：40年未能真正记取教训，努力使国家强盛起来，致遭第二次侵略。

同日，胡适应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情，写《题唐景崧先生遗墨》②诗云：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这首诗已透露出一种压抑的悲愤之情。但他所悲愤的，仍主要是中国人空度了“滔滔四十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团体，与广大教师、学生，不断有急切要求抗日的表示。而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辞，坚持不抵抗。东三省很快落入敌手。胡适从他的“理性”出发，认为当时中国实无对日作战的能力。因此他拥护不抵抗，并屡次建议与日本“直接交涉”，以求有条件的妥协。他的这一立场，曾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不少人甚至认为他“媚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至此，蒋介石也逐渐明确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方针。为实现这一转变，蒋氏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举行谈话会，胡适亦应邀参加。

胡适于7月9日离北平去南京，12日赴庐山。③

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从16日开始，20日结束。26日，第二期谈话会开始，胡适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于28日下山抵南京。谈话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② 唐景崧，清末任台湾巡抚，于甲午之役，中国败绩割台之际，倡立台湾民主国以抗日军，旋即失败。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莹是唐景崧的孙女。

③ 拙作《胡适年谱》及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记作7月9日离平，11日赴庐山。但据胡适1937年8月11日给张元济的信所说，是9日离平，12日赴庐山。

会期间，胡适曾要求政府将华北交涉的全部文件公布，或印成文件分发有关人士详加研究。这一要求的实际意图，很可能是为对日交涉作准备。从他下山后与朋友谈话及向蒋介石进言的内容看，他所关注的是继续从外交途径谋求解决，避免全面战争。但这期间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交涉已毫无用处，主张对日作战。蒋介石本人这时也一再作出抗战的表示。7月13日，蒋下令孙殿英、庞炳勋部向河北进发。这是一个重要的姿态。19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日方不尊重中方最低限度的条件，则中国就临到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1日蒋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进一步表明了“齐心协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倭寇”的决心。自然，在这些公开表示的背后，蒋介石也并未完全放弃外交解决的任何机会与途径。

胡适下庐山到南京后，和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程沧波、陶希圣等颇多往来，互相交换意见。所谓“低调”是相对于抗日的主张而言，即主避战求和。“低调俱乐部”则是他们自相标榜的雅号。

7月30日，胡适到高宗武家，谈及两事：“（1）（对日）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sup>①</sup>从他当天打电话给陈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以及随后几天，他极意谋求与蒋介石深谈对日事，可以推断，他还是希望蒋氏亲自主持对日交涉，并“担负此大任”。

7月31日，蒋介石夫妇邀一些人吃饭，胡适以人多“不便说话”，只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sup>②</sup>当天下午，蒋介石、汪精卫都找高宗武谈过话，所谈内容不得而知。后来的事实

<sup>①②</sup>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可以证明，蒋、汪都信托高宗武，要他设法与日方联系。<sup>①</sup>

8月3日，胡适应邀与王世杰谈话，“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sup>②</sup>就在这一两天内，胡适还亲向汪精卫提出此主张，汪转告给蒋。而“蒋虑军心动摇，不便由彼呼吁和平，不拟变更应战立场，但令外部仍与日周旋”。<sup>③</sup>

8月6日，胡适面见蒋介石，为恐谈话之不能尽意，乃先作一长函。主要意思是：“在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和平外交的目标：（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的时候，用外费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sup>④</sup>这次谈话中，胡适并未提及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他这时的基本考虑仍是：中国军力，不足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sup>⑤</sup>

看来，蒋介石没有很采纳胡适的建议。据王世杰记载，蒋氏在第二天举行的“大讨讨论会”上，“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一——王世杰原注）之主和”。蒋氏其实是作政治姿态，要他的下属相信他的抗日方针已定，不容动摇。而实际上，他仍未放弃与日本的外交周旋，正如王世杰所说“政府既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sup>⑥</sup>但胡适这时期一再倡言和议，是颇冒舆论之大不韪的。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甚至声言应该逮捕胡适。但胡适自以为是为国家着想。所以甘冒不韪，与他的“低调同志”们继续活动对日妥协。

①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近代史所印行。

③ 《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④⑤ 《王世杰日记》第1册。

8月16日，胡氏应邀到周佛海家同高宗武、程沧波一起“密商外交进行办法”，并“预计三个月后可开始外交”。<sup>①</sup>

8月18日深夜，在周佛海家有长谈。参加的除高宗武、程沧波外，尚有梅思平、顾祝同、郭心崧。他们商定由胡适与陶希圣再去见蒋一次。<sup>②</sup>周佛海并要求胡适“在国防参议会约集同志，制定方案，促进外交”。<sup>③</sup>经陈布雷安排，8月19日，胡适与陶希圣同见蒋介石，“谈话不很有结果”。蒋氏却提出要胡适“即日去美国”的建议。由于此时胡适力主和议，而蒋介石的姿态是对日作战，他不知道此时去美国“能做什么”。<sup>④</sup>

8月28日，在程沧波家里，与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再次聚谈。30日，周又将胡适与高宗武邀至家中“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他们将所拟方案交给蒋介石，“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周佛海认为胡适是主张对日交涉的有力分子，故不愿其赴美。但考虑蒋介石派胡赴美“意旨已决”，只希望他尽量暂缓赴美。<sup>⑤</sup>

这就是说，直到8月底，胡适还在为和议奔走，仍想避免全面战争。

## 二

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胡适终于答应赴美。8月29日，王世杰奉蒋介石命，与胡适商议赴美计划，但未获具体结果。大约此时，胡适尚未由主和转到拥护抗战的立场上来，故一时难以形成赴美开展工作的计划。8月30日，王世杰向蒋建议加派钱端升、张彭春赴美作宣传。至9月初，蒋氏最后确定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赴美，为中国抗战做宣传，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① 见《周佛海日记》（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④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

③⑤ 《周佛海日记》（上）。

这是胡适对日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这时，他开始劝导汪精卫、高宗武等，不要太悲观。承认他们“当日未免过虑”。9月8日离开南京时，他明告他的“低调同志”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三人说：“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sup>①</sup>

究竟是些什么因素促使胡适的对日态度发生这一重大的变化呢？

这可从三方面分析：

（一）对日本的观察。七七事变后，日本虽口称“不扩大方针”，却一直坚持要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方的要求，连蒋介石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和平条件，日方也不肯接受。事变一个月后，日军又向上海发动攻击，并轰炸南京，在在都表示出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上海战事的情况，胡适曾在国防参议会中听过马君武和沈钧儒的报告，南京的轰炸，则更是目睹身受。日军的侵略气焰逼人日甚，这不能不使胡适考虑他的和议主张究竟有无实现的可能。

这里不妨回顾一段插曲。1935年7月，胡适的好友丁文江曾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丁氏劝蒋介石学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为赢得一段和平的喘息时间，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丁氏这个历史比喻显然很不恰当，但却颇引起胡适的兴趣。他随即写了《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大意是说，列宁下决心不惜代价去换取和平，结果却没有达到目的。开始是国内敌人的进攻，接着是好几个协约国的干涉。苏俄后来得到的和平，不是靠不惜代价的让步换得的，而是用战争打出来的。当时他曾问到：“如果万分退让的结果，还

---

• 原作如此。——编者。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4页。

换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指和平——引者），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准备走什么路？”<sup>①</sup>可以说，七七事变后，经过一段奔走和平的努力后，胡适自己重新回答了他两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

（二）对中国内部的观察。胡适原来主张妥协，基本出发点是认为中国绝对没有能力抵抗日本，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必不可收拾。倘能谋得和平，争取一段时间，谋求国内的政治统一（即指“剿共”成功和消除其他反对势力）和政治改善，然后可以一战。七七事变后，虽逐步做到了国内政治统一，胡适以中国军力太弱，故仍主避战求和。但他也逐渐看到，和平的困难不仅在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同时还因蒋介石政府没有充分的权威性和统治效力，难以承担议和的大责任。他在7月31日给蒋廷黻的信（稿）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没有避战的资格”。第一，“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政府“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漂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sup>②</sup>胡适认为，在敌人进逼日甚，国内抗战呼声甚高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充分权威性和统治效能的政府，是无力负起议和的责任的。他几次同蒋介石见面谈话，对此一定有更切实的了解。

（三）国际形势的观察。七七事变后，英、美国家的反应都是低调的。英国没有能力在东方与日本抗衡，更不愿为中国承担任何风险，何况欧洲的局势已经牵制了它很大的注意力。美国有能力同日本抗衡。但美国朝野一向为孤立主义论调所笼罩。美国人不可能为救中国而冒被拖入战争的风险。中日间要谈判和平，没有强有力的第三国的明确积极的支持是绝对无保障的。王世杰对此认识最清楚。他曾对胡适、蒋梦麟等说：“和之太难，在毫

① 《独立评论》第167号。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3页。

无保证。”当英国上海商会领袖提出中日和平建议时，王即表示：“如英、法等国不肯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类解决办法。”<sup>①</sup>以胡适同王世杰的关系，及他们教育背景思想方法上的接近，他不会不虑及此。

总之，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政权的脆弱，无力担起议和的责任，国际上又无支持和平的确实保障，这便是促使胡适产生“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的主要客观原因。

自然，胡适的转变更有其内在的主观根据。过去，人们只注意到胡适主张对日妥协让步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把他同亲日派混淆起来，不知他内心里同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侵略怀有憎恨的心理。他的低调主张，是一个学者从他的理智判断出发，以为妥协可以争取时间，避免因过早的应战而导致惨败不可收拾。他的主张究竟对错，人们尽可以批评、讨论。但因此判定他是亲日、媚日，或是在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那就未免失于偏颇了。

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都是亲日派。前三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后两人也都走了一段汉奸之路。胡适和他们不同，他压根儿没有一点亲日的思想感情。这个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那些“低调同志”肯当汉奸，而胡适本人却成为奔走抗日的外交使节。

### 三

现在，我想系统地引证一些材料，来揭示胡适从主和到拥护抗战这一转变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

#### （一）对日本侵略者的厌憎

1935年6月1日日记：“听努生（罗隆基——引者）说天津日本兵队的暴行，气得不得了！这种国家是不能存在天地间

---

<sup>①</sup> 《王世杰日记》第1册。



的。”

同年12月25日，他在和周作人的诗中说：“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曲岂能全！”<sup>①</sup>这一年的华北危机，日本人凶焰高张，压迫国民党自河北撤退，取缔一切排日的言论活动。这种无代价的让步，胡适颇不满意，所以有“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曲岂能全”之句。

1937年4月25日，他在给蒋廷黻（时任驻苏大使——引者）的信中说：“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因为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个民族了。……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若再不悔祸，我看终有大坍塌的一日。”<sup>②</sup>

七七事变后，胡适到南京，住在教育部大楼里，有朋友请他写字，他都写陆放翁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此表露其悲愤之情。到庐山的当日，他就向蒋介石说：“华北的人民怨中央政府决心不要华北了。不然，何以大家眼看见整个华北就要丢了，竟没有中央军队北来援救！”<sup>③</sup>据王世杰说，蒋介石下令动员部队由河南开进河北，胡适以及冯玉祥的进言是起了作用的。<sup>④</sup>

类似的材料自然还有许多。但这些已足够表明，胡适内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了。

## （二）对抗日将士的敬意

1933年5月，在长城抗战期间，傅作义将军的华北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一部，在怀柔与日寇激战，曾给敌人以重创。最后以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

② 此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义彬抄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感谢他将抄件给我看。

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

④ 《王世杰日记》第1册。

“塘沽协定”签字，奉命撤退。此役死官兵367人，伤284人。次年，傅将军及当地人民为牺牲的官兵建立纪念碑，特请胡适撰写碑文。胡适在碑文中流露出激越的爱国抗日的感情。他歌颂“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他以生动的白话记述：“有全连被敌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力杀敌几十的。”（此碑文影印件收在《胡适手稿》第十册中。碑文是由钱玄同书写的。）若没有爱国抗日之心，若没有对抗敌将士的衷心敬意，是写不出这样的碑文的。

1936年，平、津一带空气紧张，谣言四起。胡适担心，宋哲元会被日本人软化，乃发表《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实等于是封公开信。文中说：“我们十分诚恳地希望宋哲元先生要彻底明白他自己的立场。宋哲元先生在一般民众的心里，是冯玉祥将军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军的最高代表，是喜峰口作战的好汉。除此之外，我们不认得第二个宋哲元。”他要求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将领们要时时记得喜峰口战死的八千子弟，要他们明白，只有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立场，无论是谁，决不能有力量。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sup>①</sup>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他对抗日将领的衷心敬爱和对投降日寇的汉奸国贼的憎恶，也从而显示出，在侵略者面前，胡适的民族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 （三）对国民党政府无条件让步的不满

1935年6月，在日本压力下，“何梅协定”出笼，五十一军被迫从河北撤出，河北各地国民党党部被迫撤消，取缔一切反日

<sup>①</sup> 《独立评论》第204号。

活动。在敌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竟做出如此屈辱的让步，胡适颇为不满。6月12日，他写信给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说：“认定这回的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sup>①</sup>

是年11月，日本人利用某些汉奸加紧策划“华北自治”。19日，宋哲元、萧振瀛等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有关情况。胡适与傅斯年当场断然反对任何华北自治的企图。事后曾发表北平教育界宣言，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这伸张了正气，抑阻了一些人的动摇。24日，胡适写《华北问题》一文，警告华北当局：“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永不能洗刷的大罪人。”<sup>②</sup>胡适要求，作为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在北平的最高代表，何应钦应出面通电宣告，“此间并无要求自治之民意”。<sup>③</sup>

#### （四）民族危机之下自处处人之道

1935年6月11日，得悉“何梅协定”的屈辱让步，胡适在给丁文江的信上说：“此后此地（指北平——引者）更不是有人气的人能久居的了。”<sup>④</sup>当时平津一带敌焰甚炽，汉奸四出活动，日本特务亦甚猖狂。胡适反对“何梅协定”的态度自然很容易为敌所知。王世杰颇为胡适的安全担心，曾有信劝胡适尽快离开北平。胡适在上面提到的6月12日的复信上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作的事。

①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382页。

② 《独立评论》第179号。

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72页。

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开。”后来“华北自治”的空气高涨，胡适隐然成为平津教育界主持正气的一位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南下赴庐山谈话会。当他看出大战已不可免，看出平、津免不了要落入敌手的时候，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要她通知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尽快离开北平。后来他奉命出国，在海外得知周作人仍未离平，他曾作一首诗讽劝周氏守住民族气节，设法离平南下。可惜，周作人竟不听其劝，终于沦为汉奸。

#### （五）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胡适

当一些人猛烈抨击胡适的避战求和的主张和反对学生抗日运动的时候，日本人却始终认定胡适是他们侵略政策的敌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当天。日本驻平武官高桥氏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抗议，声称，“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有背景的，主谋的人是蒋梦麟、胡适”。<sup>①</sup>这自然不合事实。但日人之所以有此“误告”，正是胡适反对华北自治的结果。说来很有趣，胡适不赞成学生为抗日事罢课游行，然而学生们之所以罢课游行，恰是为了表示他们反对华北自治；而反对华北自治又恰恰即是胡适的主张。所以，尽管胡适不是任何一次学生抗日运动的直接策划者和组织者，可是在日人眼中，胡适的思想主张却是学生运动的“酵素”。

1936年7月，胡适率团赴美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路经日本，抵达东京时，“车站上看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他”。在日本，“从欧洲或美国来的，就是二流三流的文士，也是热闹记载的”。而对国际知名学者胡适的抵达，“日本各报纸却以沉默迎之”。原因就是，在日本人眼里，胡适是“排日的煽动家，学

---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

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sup>①</sup>后来，1938年才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杨鸿烈也证实，“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指胡适——引者）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sup>②</sup>

以上我引证的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适于七七事变后由主和转变到拥护抗战，是有其充分的思想基础的。从而，人们对胡适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态度也应有一个新的完整的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① 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原载东京《读卖新闻》1936年7月23日，《独立评论》第二一三号转载。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75页。